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工匠精神的文化基因图谱

康九星 曾善鹏

杭州市电子信息职业学校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工匠精神生成的文化母体与精神根脉,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价值同构与逻辑关联。研究以“文化基因”为分析视角,系统绘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工匠精神的内在图谱。工匠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十六字内涵,分别对应着传统文化中的四重文化基因:“执着专注”蕴含着敬业乐群、忠于职守、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基因;“精益求精”承载着精雕细琢、德技兼求、物勒工名的尚巧思想基因;“一丝不苟”凝结着业广惟勤、笃实严谨、抱诚守真的勤业操守基因;“追求卓越”彰显着守正传承、包容共生、革故鼎新的创新思维基因。这四大基因相互融通、彼此支撑,共同构成了工匠精神的文化根基与精神血脉。在此基础上,研究引入批判性视角,分析传统文化中官本位观念、行会保守主义等因素对工匠精神发展的制约,揭示工匠精神是在多重张力中传承演进的复杂历程。在新时代语境下,深入挖掘这一文化基因图谱,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 文化基因图谱;工匠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敬业;尚巧;勤业;创新

DOI: 10.65976/3080-0374.2026.06.047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1]。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深刻指出工匠精神的内涵在于“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2]。这十六字箴言,不仅是对当代劳动者精神风貌的提炼概括,更是对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血脉的深情回溯。工匠精神作为首批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其生命力正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3]。从先秦诸子的深邃哲思,到历代能工巧匠的躬身实践,中华文化始终为工匠精神的生成与传承提供着丰厚的土壤。

(一) 文献综述与学术定位

近年来,工匠精神研究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汪超通过 CiteSpace 知识图谱分析指出,当前研究主要围绕工匠精神内涵阐释、当代价值探究以及培育路径三大主题展开,整体研究历经了概念辨析、价值挖掘到实践探索三个阶段^[4]。邹其昌在其著作《工匠文化论》中系统建构了中华工匠文化体系,提出《考工记》《营造法式》《天工开物》分别代表了三种典型的工匠文化建构范式,为理解工匠精神的文化根基提供了宏观框架^[5]。祁占勇、任雪园基于扎根理论,从《大国工匠》视频资料中提炼出“匠技、匠心、匠魂”三大维度,构建了工匠核心素养的理论模型^[6]。这些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工匠精神的

内涵阐释与当代应用,对其与传统文化之间深层的内在机理,即“如何被涵养”“如何被塑造”的基因式关联,尚缺乏系统性的图谱绘制。本研究尝试以“文化基因”为独特视角,揭示敬业、尚巧、勤业、创新四大文化基因如何从传统文化深处发源,最终汇聚成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内在逻辑。

(二) 核心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文化基因”这一概念借鉴于生物学的“基因”隐喻,指文化系统中那些能够稳定传承、具有复制和变异能力的基本文化单元。具体而言,本文所指的“文化基因”需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在历史长河中具有稳定性与连续性,能够在不同时代反复出现;二是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从文献、器物、制度等多重载体中提取其核心特征;三是具有功能性,能够对工匠精神的形成产生实质性的塑造作用。基于此,本文确立了“文化基因”的筛选标准:从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十六字工匠精神内涵出发,反向追溯其在传统文化中的对应形态;通过文献梳理,考察这些形态是否在历代典籍、制度、工艺实践中持续显现;验证其与工匠精神培育之间的内在关联。“文化基因图谱”则是将这些基因及其相互关系以系统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形成一幅可理解、可分析的文化传承地图。

研究方法上,本文综合运用文献分析、考古成果参照、工艺复原研究等方法,力求将思想史与物质文

基金项目: 2025年浙江省中华职业教育科研项目立项课题“基于扎根理论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工匠精神耦合机制研究”(编号 ZJCV 2025A49)。

化史相结合,使论证更为立体和坚实。在充分肯定传统文化积极价值的同时,本文亦引入批判性视角,分析传统文化中不利于工匠精神发展的复杂因素,以期获得更为全面、辩证的认识。此项探索,对于深化理解工匠精神的文化本源,进而更有效地传承与弘扬,具有重要价值。

一、“执着专注”:敬业精神的文化基因

执着专注,是工匠精神的基石,体现为“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与“心无旁骛”的纯粹。这种对职业的敬重与对事业的坚守,其文化基因深植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敬业传统之中,具体凝结为敬业乐群的职业情怀、忠于职守的职业伦理以及锲而不舍的职业信念。

(一)敬业乐群:敬事而信的起点

中华文化自古便有推崇“敬”字的传统。孔子曾多次强调“敬”的重要性,无论是“执事敬”(《论语·子路》)还是“修己以敬”(《论语·宪问》),都指向一种对待事务的严肃、恭谨态度^[7]。这种“敬”不是被迫的服从,而是发自内心的敬畏与热爱。北宋理学家程颐将其精妙地阐释为“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8],意即精神高度集中、心无旁骛,这正是“专注”的古典注脚。韩非子从功用的角度论证了这种“不迁业”的价值:“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韩非子·解老》),频繁变更职业不仅损耗个人精力,更会造成社会效能的整体损失^[9]。古人深谙此道,将“安其业、专其术”视为成事之本。而“敬业”最终指向“乐群”,即在群体协作中实现个人价值。正如《论语》所言“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7],对事的“敬”与对人的“忠”紧密相连,个体在精益求精中成就器物,亦在协作奉献中成就社群。古代工匠将这种对职业的敬重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用一生的时光去打磨、去坚守,使得冰冷的器物也沾染了人性的温度。

(二)忠于职守:尽己之谓忠的实践

“忠”字在传统文化中不仅指向君臣关系,更广泛地指向尽心竭力的态度。孔子所言“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便是指为政者应勤勉不怠,并以忠诚之心执行政务^[7]。这种“行之以忠”的精神,同样适用于各行各业。东汉马融在《忠经》中提炼出“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10]的命题,将“忠”定义为心志的专一不二,人人各有所事,便应各尽其所“忠”。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以“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11]道破了“专一”与“成就”之间的必然联系。《考工记》开篇即言:“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12],这里“守之世”三字,尤为关键。它定义了“工”不仅是技艺

的掌握者,更是技艺的守护者与传承者。将一门手工艺代代相传,本身就是对“职守”最深沉、最长久的忠诚。《聊斋志异》中“艺痴者技必良”^[13]的论断,同样强调了这种近乎痴迷的专注所催生的卓越。

(三)锲而不舍:功在不舍的坚韧

《荀子·劝学》中的名言“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14],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精神的象征。这正是工匠面对坚硬材料时,那份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写照。工匠之路,从无坦途。史料记载敦煌的古代工匠“率多贫寒”,在“朝驱暮役,劳筋苦骨”的艰苦条件下,依然“前仆后继、笃行不怠”,最终留下了举世瞩目的艺术宝库^[15]。蔡伦改进造纸术,史载其“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客,曝体田野”^[16],这“每”字背后,是无数个放弃休息、潜心钻研的日夜,是超越常人的坚韧与付出。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支撑着工匠们在日复一日的枯燥与艰难中,将平凡的劳动升华为不凡的创造,实现了从“技”到“道”的跨越,并将个人的价值追求融入民族文化的星河,达成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共生^[17]。

(四)批判性视角:官本位观念对工匠精神的制约

在肯定敬业精神文化基因的同时,必须正视传统文化中不利于工匠精神发展的因素。夏燕靖的研究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历史上工匠身份长期低微,“工匠自身话语多有缺失”。殷墟甲骨卜辞中“多工”的记载表明,殷商亡国后,西周分商遗民六族给鲁、七族给卫,其中至少九族为工匠,其身份被贬为“奴”^[18]。这种“工奴”身份导致工匠在政治上有很强的依附性,“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18]的观念使得工匠的创造性劳动始终服务于统治阶层的需求,而非自由的市场竞争。官本位观念进一步强化了“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视精湛的匠作之技为“奇技淫巧”,将“炫技”与“玩物丧志”相联系。《尚书·周书·泰誓》对帝辛的谴责即以“奇技淫巧”概括其暴行。这种价值观念严重压制了工匠的社会地位与职业尊严,使得“执着专注”的精神追求往往是在被压迫的环境中艰难生长,而非在自由自觉中获得弘扬。

二、“精益求精”:尚巧思想的文化基因

精益求精是工匠精神的核心,体现了对技艺极致的不懈追求。从《诗经》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到《考工记》的严密法度,从“德艺兼修”的境界追求到“物勒工名”的制度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尚巧”的思想,为精益求精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

(一)精雕细琢:器以载道的匠心

《诗经·卫风·淇奥》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19]

描绘了古人加工骨角玉石时的专注与精细。朱熹注云：“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20]，点明了精益求精的本质在于永无止境的优化。从“切磋”到“琢磨”，器物在反复打磨中日臻完美，而工匠的心性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修炼。《列子·力命》云“工追术”^[21]，《汉书·食货志》释“作巧成器曰工”^[22]，均将“巧”视为“工”的本质属性。“尚巧”并非单纯的技巧炫耀，而是追求器物与自然法则、功能之美的和谐统一。《考工记》记载制轮需“斩三材必以其时，三材既具，巧者和之”^[12]，这里的“和”字，便是将不同材料的特性，通过匠人的“巧思巧手”融汇成完美整体的过程。《天工开物》赞叹织造技术为“天孙机，人巧备矣”^[23]，亦是强调人力之巧与天工之妙的结合。可以说，“工”字的深层意蕴，便是这种将专注、投入与智慧融为一体的“巧于所能”。

（二）德技兼求：立身成器之本

中华文化从不孤立地看待“技”，而是将其与“德”紧密相连。孔子提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7]，并非否定“器”的功用，而是警示君子不应仅囿于一技之长，而忽略了道德的修养。朱熹进一步阐释，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24]，其根本在于内在的道德完善。欧阳修在《大匠诲人以规矩赋》中写道“匠之心也，本乎天巧”^[25]，将工匠之心与“天巧”相连，暗示了高超技艺背后需要至诚至善之心的支撑。隋代工匠李春设计赵州桥，其造福百姓的宏愿源于内心的德行，而其工程的最终实现，又依赖于精湛的技艺，这正是“德技兼求”的生动写照。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序中直言“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26]，其潜心于生产技术的研究，本身便是对“以技立身、以技济世”这一价值观的躬身践行。“德技兼求”的理念，要求工匠在追求技艺精进的同时，必须涵养德行，以德御技，方能成就真正惠及社会的“匠心之作”。

（三）物勒工名：责信相随的保障

“物勒工名”是先秦时期就已确立的一套质量管理体系。《吕氏春秋·孟冬纪》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27]。要求工匠将自己的名字刻于所造器物之上，这不仅是一种身份标识，更是一种责任担保。它将个人的声誉与产品的质量永久地绑定在一起，激励着工匠精益求精，不敢有丝毫懈怠。《荀子·王制》中描述的“论百工……辨功苦，尚完利”^[14]，正是这套制度运行的具体场景。秦汉以降，此法愈发严密。《秦律》中对兵器质量不合格有严厉处罚^[28]，《唐六典》也规定军器需“镌题年月及工人姓名”^[29]，以便“辨其名物，而阅其虚实”。

这种严苛的管理，既是外在的约束，更逐步内化为工匠的自觉追求。《礼记·王制》中“布帛精粗不中数……不粥于市”^[30]的规定，则从市场流通的终端，反向强化了生产过程中的品质意识。可以说，“物勒工名”的制度，为“精益求精”精神的代代相传提供了坚实的外部保障与内在动力。

（四）批判性视角：制度规约与精神自觉的张力

“物勒工名”等制度规约固然保障了产品质量，但必须清醒认识到，这种制度本身带有强烈的强制色彩。夏燕靖指出，仅靠制度上的规约来践行“工匠精神”是被动的，甚至是带有“奴性”的。“工匠精神”本应是自觉的精神追求，但由于工匠身份低微、话语缺失，历史上的“工匠精神”在相当程度上是“被倒逼出来的”^[18]。这一判断揭示了制度规约与精神自觉之间的深刻张力：当工匠只是在棍杖与刑罚的威胁下被动劳作时，“精益求精”很难成为发自内心的价值追求。然而南京城墙博物馆收藏的一块“网红”城砖，为理解这种张力向精神动力的转化提供了生动的例证。这块产自明初的城砖，因铭文中的“甲首刘德華”与当代明星同名而引发广泛关注。砖文显示，刘德華身兼“甲首”与“造砖人夫”两职，其姓名与“总甲黄原亨”“小甲简口口”“窑匠晏文叁”等五级责任人共同镌刻于砖身。这一制度设计将基层管理者、技术工匠与普通劳力的姓名永久绑定于城砖之上，责任链条清晰可溯。真正使“物勒工名”制度转化为精神动力的，是工匠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职业尊严感——当名字与器物永久绑定，工匠开始将自己的声誉、人格乃至生命投射到作品中，器物因之成为“立德立功立言”的另一种方式。这种转化过程本身，就体现了文化基因在历史演进中的复杂性与辩证性。

三、“一丝不苟”：勤业操守的文化基因

一丝不苟，体现的是工匠对质量的极致敬畏和对细节的严苛要求。这种“业精于勤”的做事态度，其文化基因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对勤劳的推崇、对严谨的恪守以及对诚信的执着。

（一）业广惟勤：天道酬勤的信念

《尚书·周书》中“功崇惟志，业广惟勤”^[31]的古训，揭示了功业与勤劳的必然联系。勤，是实现志向、成就事业的唯一路径。孔子所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7]，表面上讲的是工具的重要性，实则强调的是准备工作中的勤奋与用心。《天工开物》记载瓷器制作需“过手七十二方成器”^[32]，这七十二道工序，道道离不开工匠的辛勤付出与一丝不苟。而宋应星本人，在科举失意后，正是凭借着“勤”

的信念,深入田间地头、作坊工场,实地考察、记录总结,方成就了这部“百科全书”式的科技巨著。工匠精神中的“业广惟勤”基因,不仅是体力的付出,更是智慧的投入,它驱使着工匠在重复的劳动中持续精进,在平凡的岗位上追求卓越。

(二) 笃实严谨:循法守正的态度

古代工匠对制作有着近乎苛刻的严谨态度。《考工记》描述理想的车轮、编钟等器物,需达到“圜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县,衡者中水”^[12]的标准,每一个细节都必须符合法定度。这种对“规矩”的恪守,是产品质量的保证,更是匠人内心秩序的外化。《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其高超技艺的背后,是对牛之“理”(筋骨肌理)的了然于胸,是“依乎天理”的严谨探索,而非随意妄为^[33]。明代蒯祥主持建造紫禁城,因其测算极其精准,还原模型“不差毫厘”而被后世传颂。苏州的陆子冈琢玉,被誉为“碾玉妙手”,其对玉料的挑剔、对纹饰的琢磨,无不体现出“笃实严谨”的作风^[34]。“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的古训,正是这种一丝不苟工作态度的生动写照,它使工匠的作品超越了单纯物品的范畴,成为蕴含精神品格的“作品”。

(三) 抱诚守真:信以成之的基石

诚信,是工匠精神中不可或缺的道德底色。《荀子·王霸》指出:“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35]。工匠制作器物若能恪守诚信,不偷工减料,器物的品质就有保障,社会财富亦能积累。反之,《吕氏春秋·贵信》有言:“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36],一旦诚信缺失,粗制滥造、以次充好便会泛滥。诚信之于工匠,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它不仅体现在对材料的货真价实、对工序的严格遵守上,更体现在对“器物有魂”的虔诚信念上。工匠将自己的真诚倾注于器物之中,器物便仿佛有了生命,能够获得使用者的信赖与珍视。中华民族素有“一诺千金”的传统,这种诚信基因融入工匠的血脉,使得“一丝不苟”不仅是外在的行为规范,更是内在的道德自觉。无论是“物勒工名”的追责,还是“童叟无欺”的商道,其背后都是诚信价值观的支撑。

(四) 批判性视角:物质遗存揭示的历史复杂性

值得关注的是,最新考古发现为理解传统手工业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物证。2025年公布的陕西丰京大原村西周制陶遗址研究成果显示,先秦时期手工业生产组织模式与《考工记》等文献记载存在显著差异。遗址呈现“工、居、葬合一”的聚落形态,31座西周墓葬中既有随葬铜礼器的低级贵族,也有俯身直肢葬

的底层劳工,不同等级、族群的人群共处一地,表明当时制陶业已形成跨血缘的官方管理体系^[37]。这一发现改写了传统认知中“世工世族”“工匠之子莫不继事”的行业形态,揭示了官营手工业突破宗族界限的组织特征。这种高度组织化的生产模式,既保证了产品“工艺精湛”的品质,也意味着工匠的劳动是在严格管控下进行的。“一丝不苟”的精神追求与官府“棍杖管理”的严苛规训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传统手工业发展历程中复杂而真实的历史图景。这也提醒人们,文化基因的传承从来不是线性、纯粹的演进,而是在多重力量博弈中实现的辩证发展。

四、“追求卓越”:创新思维的文化基因

追求卓越,是工匠精神的最高境界,体现为不断超越自我、勇于创造的奋进姿态。这种精神品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苟日新,日日新”的创新思维一脉相承,具体表现为脚踏实地的传承坚守、包容共生的和谐智慧以及革故鼎新的奋进勇气。

(一) 守正传承:固本以开新

创新并非凭空而来,它往往建立在深厚的传承基础之上。《百工由圣人作赋》云:“虽大匠之述作,皆往哲之规为”^[38],即使是技艺高超的大匠,其成就也离不开对前人经验的遵循与继承。孟子曾言:“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孟子·尽心上》)^[38],强调了规矩和传统在技艺传授中的根本性地位。古代技艺的传承,多遵循“世袭其业,家传其学”的原则。《礼记·学记》以“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39]为例,说明这种传承不仅是技能的延续,更是思维方式、职业精神的熏陶。正是这种对传统的敬畏与扎实承继,为后人的创新提供了坚实的“肩膀”。工匠在熟练掌握前人法度的基础上,方能“守正”而求“创新”,使技艺之树根深叶茂,常新常青。

(二) 包容共生:取法自然之和

卓越的创造,往往源于对自然与社会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尊重。古代工匠在造物活动中,始终秉持“天人合一”的理念,追求人与物、物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考工记》强调制轮需“斩三材必以其时”^[12],取材需顺应天时;制弓则需“取六材必以其时”^[40],根据四季变化处理不同材料,体现了对自然节律的顺应。对于木材的阴阳面,也要区别对待,“以火养其阴,而齐诸其阳”^[12],方能使之坚固耐用。这种对自然规律的尊重,本身就是一种大智慧。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正是通过巧妙设计,实现了对岷江水的“疏导”而非“堵塞”,使水利工程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泽被千年^[41]。这种“包容共生”的和谐观念,赋予工匠的创新以深

厚的底蕴和长久的生命力。

(三) 革故鼎新：与时偕行之勇

《周易·杂卦》以“革，去故也；鼎，取新也”^[42]定义了变革与创新的本质。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数千年而生生不息，正因其具有“革故鼎新”的内在驱动力。墨子主张“述而又作”（《墨子·耕柱》）^[43]，即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更要有所创造，使“善之益多也”。这种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工匠勇于突破。毕昇在雕版印刷盛行之际，敏锐地洞察其局限，凭借无数次实践，最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印刷史上的伟大变革^[44]。这一创新，并非惊世骇俗的颠覆，而是实事求是的改良，体现了脚踏实地、追求实效的革新智慧。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呈现出突破礼制束缚、追求艺术表现的新风尚，被郭沫若先生赞为“践踏传统于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之飞翔”^[45]的革新气象。蒙恬制笔，也是在前人基础上精益求精，以“精于前人”的创新而“独擅其名”^[46]“革故鼎新”的基因，赋予工匠不断超越自我、勇攀高峰的勇气，使其作品不仅是技术的产物，更是时代精神的结晶。

(四) 批判性视角：行会保守主义与创新的内在悖论

在肯定创新基因的同时，必须看到传统手工业中也存在着制约创新的保守力量。王星对中国师徒制的研究表明，明清时期行会制度中形成了严格的技能传承壁垒。匠籍制度瓦解后，民间工匠招收学徒“不是基于劳动力市场，而是通过社会关系进行介绍连接”，“需要设立熟人关系式举保机制以分担民间工匠传授技能的风险”^[47]。这种封闭性的技能传承方式，本质上是工匠群体在市场压力下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但其客观上造成了技术垄断和“传内不传外”的保守心态。行会行规中关于技术保密、限制竞争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技术创新和扩散的活力。这种行会保守主义与“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之间存在着持续的张力，工匠精神的演进正是在这种开放与封闭、创新与保守的辩证运动中实现的。这也启示人们，对工匠精神的理解需要超越理想化的单一叙事，还原其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复杂面貌。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4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为弘扬工匠精神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本文以文化基因图谱为

分析框架，系统揭示了工匠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层关联，同时也引入批判性视角，分析了官本位观念、制度规约与精神自觉的张力、行会保守主义等因素对工匠精神发展的制约，力图在历史复杂性中还原工匠精神传承演进的真实图景。从理论层面而言，本研究将“文化基因”这一隐喻性概念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工具，确立了文化基因的界定标准与筛选方法，为同类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参照。从学术对话角度，本文回应了夏燕靖关于工匠精神“倒逼机制”的论断，揭示了制度规约如何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精神动力；呼应了邹其昌关于建构中华工匠文化体系的主张，将宏观体系建构与微观基因分析相结合；补充了祁占勇等学者对工匠核心素养的研究，从文化根源层面揭示了“匠技、匠心、匠魂”三维素养何以生成的历史逻辑。从实践层面而言，深入挖掘这一文化基因图谱，有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不竭的精神动力。从战略层面而言，有助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当前应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弘扬工匠精神，激活敬业、尚巧、勤业、创新等文化基因，同时以辩证的态度审视历史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让古老的工匠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加磅礴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6.
- [2] 习近平. 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4.
- [3] 隋灵灵. 现代工匠精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探析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5(2): 73-82.
- [4] 汪超. 工匠精神研究脉络、热点及展望的知识图谱研究 [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3): 33-40.
- [5] 邹其昌. 工匠文化论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6] 祁占勇, 任雪园. 扎根理论视域下工匠核心素养的理论模型与实践逻辑 [J]. 教育研究, 2018, 39(3): 70-76.
- [7] 论语 [M]. 张燕婴,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8] 程颢,程颐.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45.
- [9] 韩非子[M].陈秉才,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102.
- [10] 孝经忠经[M].张景,张松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0:147.
- [11]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186.
- [12] 考工记译注[M].闻人军,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3] 李桂奎,冀运鲁.聊斋志异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97.
- [14] 荀子[M].张晚林,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22.
- [15] 刘昉,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152.
- [16] 刘珍,等.东观汉记校注[M].吴树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816.
- [17] 邹宏秋.工匠精神的文化记忆与时代价值[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18):14-18.
- [18] 夏燕靖.斧工蕴道:“工匠精神”的历史根源与文化基因[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7(5):16-27.
- [19] 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42.
- [20] 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2:205.
- [21] 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1120.
- [22] 宋应星.天工开物译注[M].潘吉星,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2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53.
- [24]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857.
- [25] 宋应星.天工开物[M].管巧灵,谭属春,点校注释.长沙:岳麓书社,2002:2.
- [26] 吕氏春秋[M].张双棣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121.
- [2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45.
- [28] 李林甫,等.唐六典[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595.
- [29]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13.
- [30] 尚书[M].慕平,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276.
- [31] 宋应星.天工开物[M].潘吉星,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221.
- [32] 庄子[M].孙通海,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55-56.
- [33] 韩丛耀,朱永明.中华图像文化史·明代卷[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7:657.
- [34] 张觉.荀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61.
- [35] 吕氏春秋[M].陆玖,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398.
- [36] 郝佳伟.丰京制陶遗址取得重大考古突破改写“世工世族”传统认知[N].陕西工人报,2025-04-14(2).
- [37]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M].北京:中华书局,1934:40.
- [38] 孟子[M].万丽华,蓝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313.
- [39] 礼记[M].胡平生,张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689.
- [40] 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4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407.
- [42] 周易[M].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611.
- [43] 墨子[M].李小龙,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198.
- [44] 沈括.梦溪笔谈[M].张富祥,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198.
- [45] 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05.
- [46] 赵翼.陔余丛考[M].栾保群,吕宗力,点校.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303.
- [47] 王星.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中国工厂师徒制变迁历程的社会学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12.
- [4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70.